



外教社
博学文库

论帕特里克·怀特 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

THE TRAGIC SIGNIFICANCE IN
PATRICK WHITE'S FOUR NOVELS

吴宝康 著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论帕特里克·怀特 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

THE TRAGIC SIGNIFICANCE IN PATRICK WHITE'S FOUR NOVELS

吴宝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帕特里克·怀特四部小说的悲剧意义 / 吴宝康

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2552-4

I. 论… II. 吴… III. 怀特, P. (1912~1990) —小说研究 IV. 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8706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李 欣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2552-4 / I · 0199

定 价: 2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序

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英语技术职称评审面试会上，我认识了吴宝康。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为人厚道，英语基本功扎实。所以评审面试一结束我就出去同他打招呼，欢迎他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他当场答应了。后来，他如约来考，而且成绩还相当不错，就这样，他开始了攻读华东师大博士的新历程。从此，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又多了一位新人。

他后来同我的接触，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第一个印象。他为人确实很老实，老实得甚至有点迂。他的英语有相当功力，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的韧劲。记得有一次他拿了一篇写好的评论《沃斯》的文章给我看。说实话，我不是很满意，提了不少意见，退回给他。我原以为他会做些小修改，投给一家无名的杂志了事。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星期，他拿了那篇几乎重写过的文章给我看。我又提了些意见。他又拿回去修改，不久又拿来给我看。如此不知反复了多少回，到最后一稿的时候，文章已经改得很不错了。当时，我也为他高兴，建议他投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杂志。大概半年之后，他的评价《沃斯》的论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之后，这篇论文又经专家异地匿名评审，荣获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我想，恐怕就是这种韧劲成就了他。也正是这种韧劲使他不畏艰难，把难懂的怀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关于怀特作品的研究，国内外评论界已经发表了很多文章。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人探讨它的悲剧意义，有人甚至认为，现代世界已不存在

悲剧,因而讨论怀特作品的悲剧意义就失去了前提。

II 吴宝康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根据现代悲剧理论家的观点,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悲剧,认为悲剧不一定存在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悲剧的主人公不一定是英雄,或者是个性强悍者。在现代社会中,悲剧主人公常常是小人物,现代小说的悲剧意义往往体现在对普通人,尤其是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上。怀特的小说正是刻画了这些小人物在物化了的现代社会中,苦苦追求崇高和完美,虽然不被人理解,而且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显得势单力薄,但他们仍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直至生命的尽头。其悲剧意义在于,这些弱小的生命敢与强大的恶势力相抗衡,尽管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完成了自身心灵的净化,到达了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彼岸。

吴宝康的著作对怀特的《姨妈的故事》、《沃斯》、《活体解剖者》和《特莱庞的爱情》四部小说作了细致深入的文本研究,从现代悲剧的角度,揭示了怀特作品深刻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义。他发前人之未发,很有独创意义。著作思路清楚,分析精到,论据充足,行文也比较流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领域,又多了一部有分量的新作。

我把这部著作推荐给读者。

黄厚深

写于紫藤斋

2011年12月

前 言

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是20世纪的文学巨匠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文坛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怀特一生共创作了十二部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九个剧本、一部自传和一些诗歌。他的许多作品已被译成中、法、德、俄、日、西班牙、捷克、波兰、瑞典、挪威、芬兰等国文字而享誉世界。作为一个写作风格独树一帜,深受欧洲文化,尤其是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怀特不拘泥于狭窄的澳大利亚视野,他的创作超越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作家亨利·劳森(Henry Lawson)所奠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辟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¹成功地推进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化”潮流,将“澳大利亚文学置身于国际版图之上”,²因而对澳大利亚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作品“规模宏大,信心百倍,创造力旺盛”,³“把世界当作了自己的舞台”,⁴显示出他对人类心灵的深刻洞察力,倾注了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关注。

目前,世界上对怀特的研究已涉及其作品的方方面面,而对作品本

1 黄源深. 澳洲文学史上的“怀特时代”[A]. 澳大利亚文学论[C]. 第46-58页.

2 “Patrick White.” Obituaries. *The Times* (London), Oct. 1, 1990:16.

3 William Walsh. *Patrick White's Fiction*. 41.

4 胡文仲. 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A]. 唐正秋(主编). 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C]. 第203页.

IV

身悲剧性的研究暂付阙如。有感于此,作者按照怀特小说作品的创作时期,选取四部小说,即《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沃斯》(*Voss*)、《活体解剖者》(*The Vivisector*)以及《特莱庞的爱情》(*The Tivyborn Affair*),依据所能搜集到的怀特研究资料,运用国内外一些悲剧理论家有关现代悲剧的理论以及欧洲的一些当代哲学思潮,进行独立研究解读,旨在论述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

1

帕特里克·怀特于191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但在澳大利亚悉尼长大。他在十三岁那年被送到英国读中学,进了切尔腾纳姆学院(Cheltenham College)。高中毕业后,他返回澳大利亚,在牧场里打了两年工。1932年,怀特再度赴英,进入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攻读现代语言学,广泛阅读欧洲文学经典作品。他在1935年毕业后迁居伦敦。在那里他结识了罗伊·德·梅斯特(Roy de Maistre),后者引导他接触了现代主义。同时,他开始修改第一部小说《幸福谷》,并于1939年正式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在英国皇家空军任情报官员,先后被派遣至非洲、中东地区以及欧洲的希腊等地执行任务。1946年怀特复员后回到伦敦,但不久即返回澳大利亚,在悉尼定居。自此,他专心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赢得声誉。怀特于197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在悉尼逝世。

怀特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他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幸福谷》(*Happy Valley*, 1939)、《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 1941)、《姨妈的故事》(1948)、《人类之树》(*The Tree of Man*, 1955)、《沃斯》(1957)、《战车上的乘客》(*Riders in the Chariot*, 1961)、《坚实的曼陀罗》(*The Solid Mandala*, 1966)、《活体解剖者》(1970)、《风暴眼》(*The Eye of Storm*, 1973)、《树叶裙》(*The Fringe of Leaves*, 1976)、《特莱庞的爱情》(1979)以及《百感交集》(*Memoirs of Many in One*, 1987)。自从小说《人类之树》的出版获得国际声誉后,怀特开始为批评界所瞩目。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以及中国等国有许多学者专门致力于

怀特研究,并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但怀特作品的深奥艰涩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为人熟知的事实可聊以佐证:曾几位前苏联女学者试图翻译怀特小说,结果因理解和翻译作品之艰难而相继得了神经衰弱症。事实上,就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图书馆里,怀特的作品常常前半部被读者翻旧了,后半部依然很新。¹理解和阐释怀特作品的意义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正如批评家约翰·麦克拉伦(John McLaren)所说的那样,“〔怀特〕的作品继续挑战我们对我们自身和社会现实的理解能力,并且仍然有待于多种角度的解释。”²而怀特本人也对批评界颇多微词。他在给一位批评家的信中毫不客气地宣称:“我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批评家在谈论我的作品时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³因此,要真正解读怀特作品的丰富内涵,理解他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诠释,领悟他所传递的生活真谛,尚须不断地努力和探讨。

迄今为止,对怀特作品的研究已涉及到不同的批评流派,对他作品的评价也众说纷纭,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许多批评家们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他作品中更为深刻的悲剧精神。有些研究者如巴里·阿盖尔(Barry Argyle)、R·F·布里森登(R. F. Brissenden)、帕特里夏·A·莫莱(Patricia A. Morley)等人甚至否认了怀特小说中的悲剧意义,将怀特小说归入喜剧作品。但他们既难以解释怀特作品中所表现的危及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又无法根据喜剧理论来说明怀特式人物在明知绝望的情况下,为个人尊严和价值而做出抗争,直面认同危机,追求精神家园的悲剧精神。

事实上,悲剧意义构成了怀特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怀特对现代人生存悲剧所作的独特诠释。一些研究者如A·M·麦卡洛克(A. M. McCulloch)和玛丽-安·伯格(Mari-Ann Berg)已经研究了怀特的悲剧观,但重点在于怀特的创作意图和观点,而不在于怀特作品本身的悲剧意义。此外,由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一些严峻问题如非人

1 怀特本人对此颇有抱怨。See Christine Flynn, Paul Brennan, eds. *Patrick White Speaks*. 16.

2 John McLaren, ed. *Prophet from the Desert: Critical Essays on Patrick White*. i.

3 V. Brady. "A Single Bone-Clean Button": The Achievement of Patrick White." 35.

VI

性化的环境, 社会对人的异化, 社会生活中的反个性化以及“上帝之死”所产生的信仰危机等, 怀特对这些问题的深切关注证实了现代悲剧的要素。正是怀特小说中的这些悲剧因素显示了怀特对人类生存根本问题的洞察力, 增强了“怜悯和恐惧”的戏剧效果。再者, 怀特式人物的命运和生活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怀特对人类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悲剧观。因此, 有必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究怀特所构建的悲剧世界。

2

但是, 有许多人认为现代社会不可能存在悲剧, 要深入探讨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 就有必要首先界定悲剧, 尤其是现代悲剧的定义, 以便证明悲剧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众所周知,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对悲剧最早下的定义是: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它的媒介是语言, 具有各种悦耳之音, 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 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 而不是采用叙述法; 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¹

然而, 时过境迁, 在悲剧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明显地偏离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定义的现象。随着文学形式的发展, 内容也随之变化, 以适应社会、政治和语境的变迁需要, “表达时代的思想和感情, 并反映民族性格”。²事实上, 不同时期的悲剧理论家均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

在现代, 赫伯特·J·穆勒 (Herbert J. Muller) 认为任何作品, 只要描述可怕和可怜的事件, 或者说人类经验中“悲惨的”方面, 就可以称之为悲剧, 因为这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³ 而现代悲剧的关注点

1 亚里斯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19页.

2 Jeannette King. "From Tragic Drama to the Tragic Novel (1978)". Draper 195.

3 Herbert J. Muller, *The Spirit of Tragedy*. 14.

则主要是人类的生存问题。

事实上,从《幸福谷》到《特莱庞的爱情》,怀特笔下的人物都经历了生存的苦难和挫折。他们的经历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诸如生存的意义,道德与价值观方面的困惑等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经常面对的一些问题。这些人物的生存是为了探索生命的意义,证明在社会中的生存合理性或寻求他们失去的身份。既然上帝已经死了,他们就踏上了各自的精神之旅,努力实现自身的精神升华,以恢复人类已经失去的那种简单而又真诚的人际关系,或者解构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便重塑自己的理想。但不幸的是,他们均以失败告终,被孤立于社会的主流之外,却又拒绝妥协。怀特将他的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中,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去揭示人类的悲惨经验,探讨人类的悲剧命运。结果,在怀特的叙述艺术中,悲剧意义构成了其作品的重要价值,成为怀特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

由此看来,怀特悲剧世界的深刻性毋庸置疑,因为几乎他的每部小说都涉及“人类的命运问题”。理查·库恩斯(Richard Kuhns)认为在现代,悲剧已经带着陌生的和离奇的面具转化为一种现代性。¹怀特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善于有意识地为原本普通的物体或人物罩上“陌生的和离奇的面具”,以取得诗意之美和神秘之感。怀特忠实地再现了他笔下人物的精神危机和寻找解救的努力过程。因此,怀特小说的悲剧从根本上来说表现的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尤其是弱小人物的生存悲剧,或者说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3

小说《姨妈的故事》系怀特早期创作中第一部成熟的作品。这部小说并非如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属于现代喜剧,而是描述了一位普通女性的人生悲剧。从女主人公对社会现实的认同危机,从她寻找真实自我所陷入的精神困境,从现代人类生存的内在危机的角度,怀特描绘了希奥

1 Richard Kuhns. *Tragedy: Contradiction and Repression*. 5.

多拉 (Theodora) 明知无望, 却坚持不懈地抗争社会对个性的否定, 以维护个人价值和人的尊严, 最终导致生存悲剧的过程。

VIII

作为“所有怀特式人物中最为孤独的一位”,¹ 希奥多拉经历了认同危机, 这首先体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 尤其是在她与象征传统势力的母亲的冲突, 以及她与代表世俗平庸的妹妹范妮的对立之中。其次, 她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在于她对社会习俗和传统所持的否定态度, 这从另一个角度象征着她的认同危机。她先后对两个求婚者的拒绝实际上是她对他们自私的占有欲和大男子主义的否定以及对男性统治社会的挑战。而她对传统的社会习俗和价值观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将她置于他者的地位。

希奥多拉的欧洲之旅是她恢复生活信念、寻找真实自我、追求理想生活的精神朝圣之途。然而, 法国米迪旅馆的梦幻花园仅是她的幻觉世界而已, 她在那里并没有找回失去的自我。她在美国最终决定遁入疯人院, 终结了她的精神悲剧。小说揭示了社会对个人真实性的根本否定, 以及个人对此否定的无能为力。其积极的悲剧意义在于, 希奥多拉的精神求索虽然未能使她找到理想所在, 却完成了她在社会中生存状态的异化, 而她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同时不断求索、不畏挫折和失败的过程则是永恒的人生价值所在。

《沃斯》堪称怀特最为著名的一部杰作。作品描绘了超人式英雄德国探险家沃斯 (Voss) 在澳大利亚内陆沙漠探险失败的经历及其悲剧性结局。小说的悲剧性体现在人性和神性的冲突、人性内在的冲突以及沃斯在悉尼社会遭遇的认同危机中。

对沃斯而言, 地理探险寓意着取代上帝, 征服精神领域和控制他人心灵的尝试, 而他的失败则是他尼采式超人梦的终结。沃斯的失败同时还属于叔本华所推崇的人性悲剧,² 证实了人性中善恶并存, 体现了怀特对人性的探索。沃斯和罗拉的关系象征着他性格中两种对立冲突的

1 Geoffrey Dutton, *Patrick White*. 18.

2 叔本华认为悲剧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悲剧的肇祸者与不幸命运的承担者为同一人。第二类悲剧由命运, 或者偶然, 或者错误造成, 导致英雄人物毁于命运之手。但叔本华推崇的第三类悲剧所表现的是普通人之间的相互对立和冲突, 将人性的内在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参见: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版, 2004年, 第352-353页.

力量,而探险队则体现了各种不同的个性,外化了人性的善恶冲突。白人和土著黑人之间的对立冲突则是人性善恶之争的另一种表现。沃斯死于土著黑人之手表明他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为白人殖民者的人性之恶做了历史的赎罪。沃斯的探险失败是人性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沃斯》还揭露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具体表现为沃斯生前和死后在悉尼社会的错位和无归属感。实际上这是沃斯的个性生存悲剧。悉尼居民根本不理解沃斯。他们宁可将沃斯敬若神明,而不是把他视为凡人。沃斯“寻求凡人地位的漫漫归途”却以自己被铸为铜像而告终。正如他希冀为神的愿望遭到破灭一样,他返回凡人的希望也不可能实现,这恰如其分地暗示着他在人与神之间无所适从、难以获得认同的尴尬与困境。

然而,沃斯仍不失为一位史诗般的悲剧英雄,他毫不畏缩地面对超人梦被无情否定的现实,以非凡的勇气走向死亡。沃斯承认自己凡人的弱点既是对超人梦的醒悟与讽刺,又是其正视真实自我的勇气,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的表示,从而取得了积极的悲剧意义。虽然他的超人梦和重构新的精神世界的企图被否定了,但他不是简单地从起点回到起点,而是在否定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肉体 and 精神的磨难真正地实现谦卑,因而在精神上超越了他原先狂妄自大的自我。

《活体解剖者》是怀特作品中争议最大的一部。因其不可避免地涉及性爱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读者道德意识的冒犯而被称为“怀特作品中最为诲淫之书”。¹ 小说表现了艺术家赫特尔(Hurtle)的悲剧。

小说中的赫特尔可以说是陷入了生存的双重困境。从社会意义上,他既不属于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又不属于富有的上层阶级家庭。而在精神意义上,他远离社会主流,但又无法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试图通过艺术的方式,依赖超人意志解决困境。他“以自己的语言来解释世界”的雄心体现在他以后的艺术创造之中。这同时也是他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我神化的过程。从现代悲剧的角度来看,《活体解剖者》叙述了艺术和现实之间,“上帝的反对者和上帝的模仿者”之间的悲剧冲突。

1 Carolyn Bliss. *Patrick White's Fiction: The Paradox of Fortunate Failure*. 129.

这种冲突背后是灵与肉的背离,个人与社会的对抗,物欲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峙。这些矛盾构成了人本体意义上循环往复的人的生存困境。

X 赫特尔与几位女性既亲密又对立的关系在他的精神悲剧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首先,他的活体解剖象征着他在艺术领域中不惜牺牲模特儿的女性尊严和个性为代价的超人梦。其次,他和这些女性的关系还象征着在他男权统治的超人般疯狂下,女性所遭受的广义上的悲剧命运。赫特尔在享受艺术上成功之日,正是他的模特儿被艺术肢解之时。她们被简化为符号,成为抽象的美,仅具美学意义,而不再是具备正常情感和欲望的人。最后,一如女性在社会传统上被剥夺生存自由,屈从于男性的欲望,赫特尔的模特儿沦为艺术领域里男性统治的牺牲品。赫特尔的生存意义在于艺术世界,但为了证实其自我生存的真实性却否定了他模特儿的生存意义。具有悲剧意义的是,他的活体解剖使他走上艺术上成功之路,同时他也将现实生活本身和人的关系解构得支离破碎。作为艺术家,赫特尔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既是纯粹艺术的维护者,又是现实生活的毁灭者。

《特莱庞的爱情》是怀特生前宣称自己最满意的三部作品之一,²叙述了埃迪·特莱庞(Eddie Twyborn)为寻找合适的生存地位而不断变换性别的梦魇般经历。埃迪生来具有极强的女性意识,遭受性别错置的痛苦。他以女性的身份来逃避家庭和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望。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力量和安吉洛斯沉溺于死亡的拜占庭文化粉碎了他的幻想。而在大战后埃迪作为男性的经历同样让他感到沮丧。他在自己家里经受了更为痛切的精神上的无家可归。在勒辛顿农场,埃迪陷入了更为尴尬和复杂的境况。他既不能从女性世界,也不能从男性世界

1 一些评论家如 John B. Beston 和黄源深都觉察到主人公的名字赫特尔(Hurtle)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伤害、损伤”内涵,因为英语中“hurt”就是“伤害”之意。John B. Beston 指出:“赫特尔的名字本身即意味着对他本人的伤害和他自己去伤害他人的欲望”(John B. Beston. "Patrick White's *The Vivisector: The Artist in Relation to His Art*" 169)。另参见: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M]. 第 324 页。

2 另外两部分分别是《姨妈的故事》(*The Aunt's Story*)和《坚实的曼陀罗》(*The Solid Mandala*)。See Patrick White. *Flaws in the Glass: A Self-Portrait*. 145.

中得到真诚的爱。他想做男人的愿望也破灭了。埃迪在伦敦以伊迪丝夫人的身份再次遁入女性世界,这是他为确立合适的性别身份并证明自己合法存在所作的最后努力。而埃迪/伊迪丝终于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则表明社会最终拒绝他/她的存在和社会清除异端的残酷。

埃迪的悲剧还展现了生与死的冲突对抗。战争是一种毁灭性力量,将埃迪所牵涉其中的隐性而又无法调和的种种矛盾外化了。战争永远意味着死亡,影响着埃迪梦魇般地寻找自我真实性的悲剧命运。埃迪的姓“特莱庞”一词在英语中隐含着“第二次出生”,或者“重生”之意。他的重生有待于性别身份得到社会确认。但伴随战争而来的死亡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与他重生的希望构成对立。而社会对贴上“同性恋”标签的个人则怀有根本的敌意。因此,对埃迪而言,死亡的威胁和重生的期望之间的对峙意味着在爱的名义下埃迪不断经受的幻想和幻灭,直至他毁灭于悲剧的冲突之中。埃迪的性别困惑象征着他社会中的困境,变换性别是一种消极逃避,但他不屈不挠地主动寻求失去的自我的态度却显示了他积极解决困境的决心。通过他的悲剧命运,《特莱庞的爱情》从又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现代悲剧,并深化了对现代人所处困境的再现,戏剧性地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以毁灭个性来威胁人的生存危机。

4

批评家麦卡洛克曾对怀特的悲剧小说作了一个恰如其分地评述。麦卡洛克认为:

怀特并没有企图沿着过去的传统来重新创作悲剧,而是发现了由当今现实演绎而来的悲剧形式。¹

这就是说,怀特的悲剧体裁突破了传统的模式。而怀特确实从新的视

1 A. M. McCulloch. *A Tragic Vision: The Novels of Patrick White*. 154.

角并以新颖的手法来再现悲剧世界,同时通过现代悲剧的表现方式深入探讨了人的本质。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的文化、艺术以及哲学思潮对怀特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关人的命运、存在与死亡的悲剧观点在怀特的作品中得到相应的表现。从他塑造的人物,如《姨妈的故事》中的独立女性希奥多拉,《战车乘客》中的犹太人希姆尔法勃教授,《沃斯》中的德国探险家沃斯等人物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受到了叔本华和尼采悲剧思想的双重影响,但侧重于尼采的权力意志。怀特式人物的人生经历通常如基尔凯郭尔所关注的那样,是一个孤独的现代人的罪恶感以及赎罪之路。而海德格尔有关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则在怀特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萨特将人生解释为失败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几乎无法实现自己的期待与追求。他主张唯一具有意义的是行动,无须顾及其后果。事实上,怀特式人物在生活中是行动至上者,他们始终以自己强烈的意志并通过行动去征服生存环境,虽然最终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

在怀特的悲剧小说中,涉及人的生存的悲剧冲突首先表现为怀特式人物的认同危机,这恰恰是现代悲剧的症状之一。所有的怀特人物都面临着个人身份遭到毁灭的威胁,他们均无法与社会和谐共处。其次,在代表着社会主流的群体集团和独立个人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导致个人的边缘化和被孤立状态。怀特式人物因为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而被迫沦为局外人。此外,悲剧的冲突还表现在人性内在的矛盾上,尤其是善与恶两个自我之间的对立冲突。在现代社会,人开始意识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外部世界,倒不如说来自人的自身,也即来自人性中的邪恶。正是出于这种危机感,怀特式人物尽力确保抑制邪恶的自我,希望达到真实自我的状态。

怀特以其特有的方式所构建的悲剧世界,既不同于传统的悲剧,又有别于现代文学。与一些存在主义作家暴露社会现实中的荒诞面有所不同,怀特重在强调人本身的荒诞,甚至到了怪僻的程度,而世界则在他的作品中仍经常以冷峻的、表面“正常”的面貌出现。通过突出人本身的荒诞,怀特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强加于个人身上的异化作用,从而揭露了人的本性中的内在邪恶和个人面对社会现实异化力量时的无能为力

力。因此，怀特的悲剧世界充满荒谬、悖论、异化、孤僻以及危机感。怀特式人物遭受对社会的认同危机。他们大多数一直漂泊不定，缺乏归属感，忍受身份的丧失。要重获归属感，大多数怀特式人物注定要寻求对他们来说是根本无望的精神家园。

为此，在怀特创造的悲剧世界里，其悲剧人物经常在幻想中达到对真实性的肯定。而苦难和失败则是怀特式人物自我实现的必要过程。尽管他们注定要失败，他们的尝试还是充满了意义，他们因经受这些挫折而在精神上变得富足。超人梦则是怀特人物自我幻想的极端例子。它表明上帝死后的信仰丧失，结果产生了精神危机，它暗示这些怀有超人梦的人物决心在无序中重建有序，意在填补上帝死后留下的空白。怀特式人物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了，为了抵消对他们作为他者的负面评价，他们通常在最终肯定自身存在的真实性之前经历了一个自我幻想的阶段。当他们战胜了自身内心善恶，终于能平静地面对毁灭时，他们找到了最终的自我安慰。怀特以此显示了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勇气。

总之，怀特的小说以丰富的悲剧内涵和犀利的洞察力，从多个角度独特地展示了现代人的生存悲剧，艺术地再现了“对个人命运问题的严肃关注”。

5

我们不妨扼要归结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如下。首先，怀特小说的悲剧意义表现在怀特的人物塑造中。他选择的人物通常具有独特的性格：怪异、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信奉行动至上，倾向于将自己的主观经验外化——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超人意识。由于他们性格古怪，拒绝社会价值准则和传统，他们被边缘化了，成了他者，远离社会主流。他们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在社会中的身份，难以认同现实。这些人物坚持行动的自由，无视社会习俗，不计代价，表现出存在主义色彩的悲剧意义。

其次，悲剧意义还体现在怀特式人物始终无法实现的理想上。在怀

特的悲剧世界里,怀特并没有许诺光明的希望,也没有指出任何可能性。这是怀特对现实的绝望,也是他悲剧作品的复杂性所在,其结果则增强了小说的悲剧性。

此外,绝望的悲剧精神也有助于丰富怀特小说的悲剧内涵。怀特式人物同样具备英雄气质,富有悲剧感,他们明知徒劳但仍不放弃追求理想。在他们对现存秩序的挑战中,在他们对社会标准和价值观所持的怀疑中,在他们对毫无希望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中,我们发现几乎堪与加缪笔下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媲美的悲剧气质。

最后,当怀特式人物内在和外部的非人性因素被揭露之后,悲剧效果更得到了强化。人性中的善恶共存决定了利己主义倾向为实现某种个人目的甚至自私的意图,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然而,面对毁灭的悲剧性前景,怀特式人物身上所激发出的不是怯弱,而是勇气。从他们必然的失败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深藏不露的精神力量,即平静面对灾难性后果而永不屈服的西西弗斯精神。

综上所述,怀特式人物并非如帕特里夏·A·莫莱所说的“走向赎罪的‘大团圆结局’”,¹走向主人公和他所处环境的协调和谐”,而是被迫从失望走向绝望,同时也超越原先的自我,实现了作为赎罪标志的精神升华。这正是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所称的“胜利性的”²而实质上也是悲剧性的结局。

6

本书源于我2004年底完成的博士论文,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增删修订而成。论文的完成得益于良师益友的指导、帮助和关心,还得益于在怀特研究领域里国内外众多批评家、学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此,我心存感激,在此略表一二。

首先,我衷心感谢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著名英语文学专家黄

1 Patricia A. Morley. *The Mystery of Unity: Theme and Technique in the Novels of Patrick White*. 30.

2 Arthur Miller. "The Tragedy and the Common Man." Draper 166.